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隋唐五代

巴蜀书社

译注 李国祥 等

审阅 周勋初

新五代史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新五代史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特约编辑：赵 勇

白雪梅

责任编辑：范 勇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图：罗二虎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新五代史选译 李国祥 王玉德 姚伟钧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巴蜀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1/32 印张8.875 插页4 字数110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30.27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¹¹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的人文、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在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十四史里，《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都是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历史的史书。五代十国时期，从朱温于唐朝天祐三年建立后梁称帝，建元为开平元年（907年）开始，至周世宗显德七年赵匡胤称帝，建立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元年（960年）为止，总共只有五十三年时间。在这短暂的历史时期里，我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建立过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个王朝。此外，据一隅之地建立王朝政权的还有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这是一个分裂割据、战争频仍的历史时期。宋太祖赵匡胤于开宝六年（973年）下诏修纂这一时期错综复杂的历史，由薛居正任监修，次年便修成了《五代

史》一百五十卷。这是一部官修的史书。到了后来，欧阳修私人又编纂了一部《五代史记》，一并刊行于世。因此，人们称薛居正主修的《五代史》为《旧五代史》，欧阳修编撰的称为《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的编撰者欧阳修（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是著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虽出生于仕宦家庭，但四岁丧父，靠其母郑氏抚养教诲成人，靠他自己勉敏求学成长。他的成长、他从事政治、文化活动的时期，是北宋真宗至神宗的初年，而主要是仁宗统治期间。当时的政治环境，虽痼弊不少，算不上特别昌明兴盛的时期，但是相对来说，没有发生大的动乱，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条件。农业的发展、手工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给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时机，士人们通过科举考试，有了仕进之途。欧阳修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走上宦途的同时，在文学和史学上都有卓著的成就，可以说是时代造就了他，而他也给自己所处的时代及历史增添了光彩。

欧阳修于仁宗天圣八年（1036年）考取进士，被任命为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推官，掌管刑狱事务，从此便走上了宦途。在官宦场中，屡有升

调贬降。由于他持风节，好直言，常常以为官清正自律，往往与一些权佞有矛盾，有时也与政治见解有分歧的人相忤，所以蒙受过污蔑谮毁。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属于当政者中具有影响的显要人物。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书论刺时政，被执政吕夷简所谴责，贬降饶州。欧阳修为此上书谏官高若讷，斥责他不主持公正，并直言说他“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令，此后便辗转于地方上任职，后来，才复校勘职，又进集贤校理。到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知谏院，因敢直言，受到仁宗的褒奖，进而为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后又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可是在庆历五年（1045年），又因被人诬枉，贬为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知州。后徙守扬州，复学士以后，留守南京（今河南商丘），为行政长官。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管贡举，加龙图阁学士，并为开封府行政长官。他处理政事简易循理，京师因而得到治理。接着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政治地位日趋显赫。嘉祐五年（1060年）为枢密副使，涉足于全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次年为参知政事，地位已到副宰相了。这段时期，是欧阳修在政治上最为得意的时期。继仁宗以后即位的是英宗，享国短促。欧阳修当时既处于

尊崇的地位，其所持的议论及所行之事，虽然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容易招致一些大臣们的诋诮，有的人甚至伺机谤陷，欧阳修也自知年纪已到六十，便提出辞职。神宗即位后，一面挽留他，一面降调其职为观文殿学士、刑部尚书，并为亳州知州，转而为青州知州，在任上因请停青苗法，遭到王安石的反对，他便于熙宁四年退职，熙宁五年卒，终年六十五岁。

我们从欧阳修在宦途中的作为来看，他并不醉心于高官大名，而往往以正直不苟的态度出现，讲求事功，敢于发表议论，有不顾恤官职地位而见义勇为的气概，因此为当世人所重。他所交往亲密的官员，多数属于耿直的人。在纷至沓来的矛盾中，欧阳修总是露出锋芒，祭起封建纲常道德的旗帜卫保朝廷，由是他也常处于人事关系的倾轧之中，这些虽说属于他政治生活中的得失问题，可是他在文学和史学上的造诣，又何尝不是来源于这政治生活的激励呢？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是一位大文豪，我国的文学发展史上有重要的建树。他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改变文风方面，他身体力行，成就卓著。改变文风，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积之于渐，历反复而后成。早在唐中叶以

后，有些文人已痛感文风浮靡，写文章追求的只是形式上的华丽，缺乏生气。于是韩愈、柳宗元等倡导古文运动，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反对那种内容上空洞无物，而形式上一味追求对偶的骈文。他们要在先秦两汉古文基础上，发展新的文风。韩、柳所创作的清新散文，果然在文坛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可是唐末、五代及至北宋，文风的浮艳，又复笼罩着文坛。特别是北宋初诗坛上的“西昆体”，以堆砌典故为好，追求工整对仗，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滞着文学的发展，诗文革新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当时的有识之士如穆修、石介等开其先河，欧阳修与梅尧臣、尹洙等相唱和，在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高擎诗文革新的旗帜，蔚为一代新风。欧阳修在主持嘉祐二年贡举考试时，士子们多崇尚怪涩的文体，叫做“太学体”，欧阳修极力排揆这种文体，凡是写“太学体”的，他都加以黜汰，从而改变了科场考试的积习，也改变了文风。

其次，欧阳修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他主张，无论作诗作文，都应以“明道”“致用”为宗旨，以自然简明为体式。他在创作实践中，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精神。他写的说理之论，抒情之文，都能做到中心思想明确，引物连类，声情并茂，引人入胜，因而有“文章名冠天下”

之称。他的代表作品很多，如诗作中的《食糟民》，《画眉鸟》；散文中的《五代史伶官传论》，《醉翁亭记》、《秋声赋》、《真州东园记》、《释秘演诗集序》、《朋党论》、《与高司谏书》等等都脍炙人口，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财富。

欧阳修在奖引当代学者方面，做得也是很突出的。如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等，他都宣扬其声誉，学者们也称道他的为人。欧阳修能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应该说是名实相得。

欧阳修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之从事史学撰作，一方面是机缘，另一方面是他本人的爱好。大家都知道他与宋祁主编了《新唐书》。在他们之前，早有刘昫等人撰作的《唐书》行世，但宋仁宗认为此书很浅陋，便命端门殿学士宋祁重新刊修。但到了至和元年（1054年），恰好欧阳修在被降贬为地方官九年之后调回朝廷，并任翰林学士，于是又命他主编《新唐书》。自此至嘉祐五年（1160年），《新唐书》便已编成。这个时期正是欧阳修政治生活上较为安定的时期。《新唐书》在他主持下完稿，确实是一个机遇。宋祁主修《新唐书》早在庆历四年（1044年）左右就已动笔，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主修，列传一百五十卷由他完成。他还依靠了

一批经过挑选的修撰人员，如范镇、王畴、吕夏卿、刘义叟、宋敏求等，都是熟悉唐代掌故的人。加之文献资料丰富，以前在战乱中不可得见的文籍史料，经五代末季及宋初的相对稳定时期，复在社会上流传。这些有利条件，在欧阳修任主修之前已都具备了。欧阳修凭借这些条件，加上自己的主观努力，才能克成其事。欧阳修作为主修人，确实表现了组织才能和撰作的才华。在宋祁主持下十年岁月未能卒稿的《新唐书》，在欧阳修主修的五、六年内竟然完成了。这里面固然有宋祁的功劳，但也显示出欧阳修有较好的组织才干。欧阳修不仅是总其成，而且亲自写了本纪十卷、《选举志》、《仪卫志》及志表的序，这又足以表现他撰史的才华。当然，《新唐书》不是完美无缺的书，也不是史著中的精粹，在它修成之后，当代人就开始评论它。吴缜的《新唐书纠谬》二十卷，条列二十门，四百余事，剔出《新唐书》诸多疏失问题，其中不少是公允中肯的。但作为记载有唐一代盛衰隆替的《新唐书》，能与比它问世更早的《旧唐书》并行于世而不废，这本身又证明《新唐书》自有它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肯定主编《新唐书》是欧阳修对史学作出的重要贡献。

欧阳修在史学上的另一贡献是辑录《集古录》

一书。据《宋史》本传记述：“好古嗜学，凡周、汉以降金石遗文、断编残简，一切掇拾，研稽异同，立说于左，的的可表证，谓之《集古录》”。这《集古录》共有十卷，在后人编定的《欧阳文忠公文集》里或题为《集古录跋尾》，它是我国现存的研究金石文字的最早专著。共收石刻跋尾四百多篇。欧阳修以一人之力，收集周穆王以来，直至秦、汉、隋、唐、五代散见于各地的石刻文字，并考虑到收藏的石刻难免散失，因此对各篇石刻文字写出题要，缀集为目录，他这种不厌其烦，一丝不苟的态度，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更可贵的是，他不同于古董收藏家和单纯的古物鉴赏者，而是明确意识到石刻文字对考史、证史和补充古代史料具有重大价值，并对治史者开阔见识也有裨益。在《集古录自序》中他道出自己录载石刻文字的缘由，是本于石刻文字可证史传的阙谬，并可传给后世的学者，使他们能增广见闻。由此可见，欧阳修对古代金石遗物及其文字资料，是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它们的，与古玩古董收藏者迥然不同。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过去不曾被人们充分重视，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赞誉和奖评，从我们今天弘扬古代优秀文化的角度来看，他做出的这一成果，实在是开创性的业绩，应该受到珍视。

欧阳修在史学上最重要的成就，应数他自己编撰的《新五代史》。《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共有七十四卷，其中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在他于神宗熙宁五年去世之前，《新五代史》已编撰成书，但没有在社会上传布。到他去世后的当年八月，神宗才诏令他的家人把这部史书奏上，并收藏于秘阁。书稿后来由国子监雕板印行，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并得到学者们的重视。北宋灭亡之后，金章宗于泰和七年（1207年）十一月下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新撰”。由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在思想内容上更能适应当政者的需要，因此，薛居正主编的《旧五代史》逐渐被冷落，到明代时，文渊阁尚有其书，但后来便失传，《新五代史》便享有独尊的地位。

有关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的一些具体问题，学者们多有讨论，这里提出我们的一些看法。

其一是欧阳修何时开始撰写《新五代史》的问题。由于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欧阳修本人也未曾交代，所以研究者们提出一些猜度。有人认为，在景祐三年（1036年）前已着手编写，理由是那时他给尹师鲁、梅圣俞的信中提到过修史的事。有人却